

1963年国内图书馆学讨论问题的一斑

广东图书馆学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学术讨论论点综述

广东图书馆学学会

广东图书馆学学会在一九六二年年会的学术讨论中，涉及到的方面是比较广泛的。概括起来，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关于图书分类的问题，二、关于中文图书著录是否应以著者为主要款目的问题，三、关于“外文图书中文编目法”的问题，四、关于“主题目录”问题，五、关于“开架”与“闭架”制度问题，六、关于高等学校资料工作的问题。现将这几个问题讨论中的论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图书分类法的若干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讨论的集中点及分歧点主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分类主词目录问题，二、类质与类素的问题，三、科技合一的问题。在分类主词目录问题上，主要围绕了杜定友同志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图书分类目录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兴科目的不断增加，现行分类目录愈来愈暴露出它的弱点来，这就是分类机械地依照科学系统的后果：分类层次达到十七八级，类码冗长累赘，款目从属关系不清，给读者带来许多不便。因此，现行分类表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一般说来，分类系统只分到第三级就可以了，三级以下采用主词字顺排列。主题目录虽然是一种比较直接迅速找书的方法，但容易割裂科学系统的完整性，如果按照上面的办法，把它与分类目录结合起来运用，就可以达到既保持分类目录与主题目录的优点，且避免多费一套编制目录卡的人力和物力的目的。但大家认为，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应有所区别，图书分类的目的是组织图书，不能硬套科学体系，类号应力求简短和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与杜同志商榷的意见：有人认为：分类目录与主题目录虽然都是为了揭示图书的内容，但他们的组织方法各有不同，他们是两种独立的、不同形式的目录，两者不能相互兼并或代替。此外，还必须估计到主词字顺排列法在某些学科（如史、地）也会行不通，还有人认为：分类法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它的系统性，如这一原则不贯彻到底，就很难体现图书分类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原则。也有人认为：如果系统划分只分到三级，以后书多检查起来不方便。

关于“类质”与“类素”的问题，首先对“类质”与“类素”定义进行了讨论，杜定友同志认为：类质是一个类的本质，它是一个类的主题，一个客观现象，一个科学领域，

在图书分类法上，它是一本书的论题。类素是一个类的因素，它是一个类的某一方面，在图书分类法上，它是一本书的著述形式、观点、方法、方面。类质是稳定的，类素是灵活的。大家认为：从分类表的结构上说，把两者分开有好处。至于是否定名为“类质”与“类素”，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以后又讨论了“类质”与“类素”的客观性及其区分标准问题。杜定友同志认为：类质与类素是客观存在的，假如“农业机械”、“工业经济”、“原子化学”、“原子物理”里面都包含着地位不同的两个因素，其中一个为主（即类质、主题），如“农业”，“工业”，“原子”；另一个为副（即类素），如“机械”，“经济”，“化学”，“物理”。因此，区分类质与类素是图书分类法上带有原则性意义的头等重要任务。有人认为：杜同志提醒人们注意区分分类对象的本质和现象，明确问题，抓住重点，此其优点，但这仅仅是实践中的技术措施，而不是什么“带有原则性意义的头等重要任务”。在具体划分类质与类素的问题上，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工业中的“工业”，原子物理中的“原子”都不能简单地划为“类质”，又如“物理化学”如果按“类质”与“类素”的标准区分，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物理为类质，化学为类素；二、化学为类质，物理为类素；三、两者皆类质。事实上，这门科学过去被称为理论化学，它广泛使用物理学方法来研究各种化学过程和现象，并根据物理化学原理来说明化学变化的原因，因此应入化学类，不入物理类。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光从字面上分析那是“本质”，那是“因素”，那是“稳定性”，那是“灵活性”，是徒劳无功的。再如，各类图书分类标准是不同的，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按作家排列，文学作品按国别、体裁排列，有些图书（如儿童读物）以读者对象为分类标准等，这些图书按“类质”，“类素”标准入类是有困难的。在类质与类素的配合上，有人认为它比一般表灵活得多是优点，但使用起来有时不够准确。从以上可以看出：“类质”与“类素”并不能提供确定事物本质的标准，因而，不能作为图书分类的标准。

关于“科技合一”的问题，杜定友同志主张“科技合一”。他的意见是：现行分类法的主要缺点在于：科技分家、联系失掉、系统累赘、材料分散。例如1949—1955年全国出版的关于牛的书只有28种，而书目上分列在9个小组，使材料分散，令人“目无全牛”。这种为分类而分类的

分类法，是脱离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有人赞成杜同志的意见，并又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科技合一”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有些不能“合一”的不能勉强合”第二种意见认为：从图书分类角度来考虑“科技合一”是有矛盾的。科学是理论，技术是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两者所研究的方法和方面不同，因而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也不同，在图书分类的实践中，不能合为一事。“科技合一”也不能达到集中有关图书资料的目的。

二、关于中文图书著录是否应以著者为主要款目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中文图书著录应以著者为主要款目。理由是：它符合我国目录学的真正优良传统，从中国著录发展史来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最早的一本目录著作，它以著者为主，到了《隋书经籍志》才有以书名为主的现象。以著者为主，符合著录原理，因为著者对图书起决定作用；与国际趋势相符合；目前读者的以书名查书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有人坚持中文图书著录以书名为主要款目。理由是：我国读者找书一般是以书名为主的；从图书本身说，中国许多古代文化遗著是没有著者姓名的，即使有，也不一定是真名，如果以著者为主要款目，就会增加工作上的困难；以书名标目并不意味着对作者劳动估价有所削弱。他们还说：图书著录工作应考虑是否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是否方便读者，离开这些原则的建议，不一定是合理的建议。

三、关于“外文图书中文编目法”的若干问题

大家就“外文中文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和进行这一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讨论，讨论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外文图书中文编目是必要，肯定的是今后的发展的方向。对于“外文中文编”的可能性问题，虽然目前外文中文编的人力不足，一般图书馆外编工作者也不多，一时还难以全面开展这一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逐渐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如国内不少地区图书馆都开展了集中编目工作，铅印卡片集中发行，目录质量不断提高。又如目前外文书店已将大部分外文书，影印较完备的目录，上面有中译书名及中文简介。在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上，对于全盘“中文化”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外文图书著录全盘“中文化”；有人则认为“全盘中文化”没有必要。音译转写法的问题，有人认为“外文中文编”可以先从西文图书做起，其他非拉丁语系统文字的图书则采用音译转写法。有人赞成这种步骤，但认为音译转写法实际困难很多。关于项目和格式问题以及关于目录组织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具体讨论。

四、关于主题目录问题

讨论中涉及到主题目录的作用、主题目录和分类目录

的异同、主题目录的利用、关于图书资料的合并和中外文资料的合并四个问题。对主题目录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主题目录是从图书内容的主题方面来揭示馆藏，介绍图书，指导阅读，提供图书资料的工具。如果在实行分类目录的前提下使用主题目录，它还可以对分类目录起着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对主题目录与分类目录的异同问题，大家认为：两者都是揭示图书的内容，这是相同的一面。但它们的组织方法各不相同。对主题目录的利用问题，大家认为：主题目录和分类目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在分类目录中，它是一种辅助目录。但它不能代替分类目录的作用。有人认为需要做好通盘打算，全面铺开使用主题目录。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可以在实行分类目录的前提下，从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地有重点地使用主题目录。关于图书与资料的合并和中、外文资料合并问题，有人主张收入主题目录的资料，应该不限于馆藏图书，还应包括其他论文资料。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会造成目录的庞大，使用不便；把新旧的东西排在一起，会降低它的作用。至于中外文资料合并，同样会出现目录庞大的现象。有人则认为庞大一点没有多大关系，它可以起到更广泛宣传推荐资料的作用。

五、关于“开架”与“闭架”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主张“开架”制度的人认为：开架可以使读者直接接触和熟悉图书，便利选借，提高图书流通率和使用率；手续简便，节省读者时间。主张“闭架”制度的人认为：“闭架”能够妥善地保管图书，从目前读者的思想水平，书源等条件来看，实行“闭架”比“开架”好。也有人说：“开架”与“闭架”各有长短、利弊，应对它们作全面分析。“开架”的不足，在于容易造成图书保管不善、破坏率高、丢失严重等；“闭架”之不足，在于不能直接反映库存，拒绝率高，利用周转率低，多费读者借阅手续和时间等。在实践上，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依照关于“既要保管好图书，又要方便读者”的指示精神出发，并结合到各馆读者、书源、人员配备等具体条件，灵活运用。

六、高等学校资料工作若干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了什么是资料、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与资料工作有无矛盾、关于高等学校资料工作与工作人员水平之间的矛盾问题、关于资料工作的“集中”与“分散”问题。关于什么是资料的问题：张天麟认为：“可用的材料叫资料”。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可用与否，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谓资料，不仅包括图书，其他如期刊、报纸等可供教学和科学研究参考的材料都是资料。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太笼统。关于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与资料工作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只能搞图书馆工作，不能搞资料工作，它们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矛盾，因为图书馆与资料工作都是为了读

者，目前圖書館之所以只能担负搜集、整理圖書的責任，這只是由於人力不足而出現的暫時現象。關於高等學校資料工作與工作人員水平之間的矛盾問題，大家認為是存在矛盾的。對克服這種矛盾的途徑，有人認為必須配備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的資料人員。最低一級助理資料員，也應達到高中畢業水平。有人則認為，不一定每個工作人員都須達到高中的水平，可以邊干邊學，還可以由一些有經驗的同志帶動和幫助他們提高文化與業務水平。關於資料工作的“集中”與“分散”問題，這裡實際指的是資料室工作與圖書館工作之間的關係。一種意見認為，圖書僅是資料工作的一種。絕大部分的資料工作與一般圖書館

工作不同。資料工作的特點是更加專業化，因此，資料室應有它的獨立性，資料室的工作應在系或教研組領導下進行。另一種意見認為，資料室工作離不開圖書，而處理資料的方法也與處理圖書方法相類似，所以各系資料室應由學校圖書館統一領導，資料工作也盡可能統一布置、集中使用。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把資料工作全部集中到圖書館里也有問題，主要缺點是對系的教學和科學研究了解不夠。最好的辦法是兩者合作，系與室的工作放到圖書館來搞，這樣有利於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還有人認為可按相近的專業，多設圖書館分館。這也是解決“集中”與“分散”矛盾的辦法之一。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 1963 年科學研究活動概況

李 嚴 紀國祥

北大圖書館學系 1963 年的科學研究活動，注意貫徹了理論聯繫實際和以教學為主的方針，並加強了有關現實問題的研究，在方法上除了配合北大傳統的“五四”科學討論會舉辦學術報告會外，各教研室還開展了經常性的學術活動，其中有專題性的學術報告，也有老教師幫助青年教師進修性質的小型學術活動。這些活動有力地推動了教學質量的提高和青年教師的成長，並有助於當前圖書館工作和教學工作中一些問題的解決。現就該系一年來主要學術報告的內容，綜述如下：

一、有關北大圖書館工作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報告

該系圖書館學教研室，和北大圖書館合作，就北大圖書館的藏書組織、目錄體系、教學參考書建設和教學用書供應等四個問題，組成四個小組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調查和研究。各組代表，就上述四個問題向教研室和北大圖書館部分同志做了報告。

1. 關於北大圖書館藏書組織問題

何善祥同志在《關於北大藏書組織》的報告中的第一部分中，強調了藏書組織的重要性。他認為，藏書組織和藏書利用與保管有密切關係，大型圖書館應當有專人負責這項工作。接著提出了科學組織藏書的便利讀者、便於保管、合理布局等三條原則。報告第二部分，對北大圖書館藏書布局的現狀做了分析。目前北大藏書分散、多頭，主要是歷史原因所造成，所以現在要把藏書完全集中起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該館基本藏書過分散，多頭是不合理的，根據北大的具體條件，應採取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原則。同時也提出了目前藏書布局上一些值得研究和改進的問題。第三部分，針對幾種對藏書布局的不同看

法，提出了意見。對藏書布局的幾種不同看法主要是：

第一，關於對基本藏書的許多不同意見。何善祥同志認為對基本藏書的許多不同意見與對基本藏書的性質、作用有不同理解有關。他說，基本藏書應當是全館藏書的基礎。因此，它應當完整和系統。同時，基本藏書對輔助藏書應起補充和調節的作用。他主張，根據北大現有條件，把全館基本藏書首先分成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部分。

多數人同意這個看法外，另有人主張按文字分；又有的人主張按書型分；第三種主張，是按時代再按學科分。

第二，關於課外讀物的組織問題。報告人和多數人認為，應該從基本藏書中挑選出一部分，組成帶有推薦性的輔助藏書。但對於課外讀物的範圍問題，有幾種不同看法：有的主張課外讀物的範圍只限文藝類；報告人和某些同志主張擴大範圍，增添有關青年修養、普及性的科學讀物、人物傳記和政治讀物；有人主張還要增添語文學習圖書。

第三，對輔助藏書的不同意見。對目前輔助藏書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把全校各專業學生用的指定參考書集中一處。報告人和多數同志不同意這種看法。另外有少數人主張把各種輔助性藏書取消，而在總館之下分別成立幾個學科相近的分館。報告人和某些同志認為這種主張為沒有現實可能。

2. 關於北大圖書館目錄體系問題

李紀友先生在這一份報告中，對該館目錄體系的現狀，作了較全面的介紹；並根據北大館的目錄狀況，提出了幾個問題：

第一，目錄多頭問題。目錄體系的完整與否，組織的合理與不合理，是關係到向讀者揭示館藏，宣傳推薦圖書

和指导閱讀的根本問題。目前北大圖書館目錄缺乏統一完正的體系，特別是目錄多頭的現象不能更好地發揮目錄的作用。應採取措施，有計劃有步驟的對目錄體系的這一現象，加以解決。

第二，總目錄的問題。目前北大圖書館，不論公務總目錄還是讀者總目錄，都不夠系統和完備。

許多同志對於總目錄有不同理解。有人認為“全館各種目錄加起來，就是總目錄了”；有人認為“在藏書分散的情況下，不必建立總目錄”；有些人主張“應建立反映全部館藏的總目錄”，如此等等。報告人認為，這兩種意見都是不能同意的。他說，一個具有240多萬冊藏書的大館，在藏書組織分散、目錄多頭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反映全部館藏的總目錄，對藏書建設、分編工作、讀者工作，都是很不利。為此，必須首先建立反映全部館藏的公務總目錄；其次還必須建立有配合的讀者總目錄。根據北大藏書組織的特點以及文理科讀者使用上的不同需要，可以把讀者總目錄分成兩部分來設立，一是哲學社會科學讀者總目錄（在總館），一是自然科學讀者總目錄（在自然科學專業閱覽室）。

李紀友先生的報告還提出“目錄的基本種類問題”、“目錄組織的統一化問題”和“如何處理好基本藏書目錄和各個輔助藏書目錄之間的關係”等三個問題。

3. 關於北大圖書館教學參考用書建設的主要經驗和存在問題

陳鴻聲先生在這一份報告中首先強調了教學參考用書建設的重要性。他說，教參用書建設是高等學校圖書館的一項首要任務。教參用書建設的質量，是決定圖書館正確貫徹執行教學為主方針的關鍵，也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條件之一。目前對這一點的認識並不是一致的。例如有人簡單地認為，“教參用書建設只不過照教員所開的書單子買書”；也有人認為，“高校圖書館藏書建設重點不在教參用書上，而在科學研究圖書資料上”。這兩種論調實際上都否認了教參用書建設的重要性。

陳先生在報告的第二部分指出，要做好教參用書的建設工作，必須熟悉它的特点。

在第三部分中陳先生總結了北大圖書館教參用書建設的主要成績和經驗。北大圖書館由於加強了教參用書建設工作，幾年來取得很大成績，目前已把全校520多門課的教參用書補足到90%以上，而且供應的比較及時。其主要經驗就是抓思想工作，根據黨的方針政策及時提出具體要求，抓關鍵性措施。

第四部分陳先生指出北大圖書館教參用書建設工作中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①教參用書書單還存在回收不快，回收不全的現象。他在報告中，並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改進意見。②報告人認為北大圖書館教參用書的採購標準，有待進一步研究。他主張不同的用書應有不同的補充標準。補充原則應當是：第一線用書是必讀的指定參考書，這類書的補充，品種要少復本要夠；第二線用書是一般閱

讀書，這類書的補充，品種要少，復本更要少；第三線用書是專門組課和研究生專業基礎課的教參用書，其補充標準應當是品種略多復本要少。③北大圖書館在教參用書補充方法上也還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的問題。

4. 關於北大圖書館教學用書的供應問題

陳源蒸同志在報告中着重強調了高等學校圖書館明確辦館思想，對於貫徹教學為主方針和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性。他說，高校圖書館主要是為教學服務的。教學用書的供應在高校圖書館工作中佔有很大比重，據北大統計，它們在圖書流通總量中約佔60%以上，可見做好教學用書的供應流通是服務部門最大量最主要的任務。

對於陳源蒸同志的報告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高校圖書館的全部工作都是為教學服務的，所有圖書都是教學需要的，沒有必要再提出教學用書的供應問題”；也有人認為，“僅憑教師所開書單為學生準備書看，太沒有水平，太沒有參考性了”因而，他們都不同意設立專門供應學生參考書的閱覽室。

報告人不同意上述意見，他認為如果對教學用書的供應不做重點安排，把各項工作混在一起，沒有主次，那必然會出現盲目被動的局勢，其結果是讀者要求得不到滿足，不能更好地為教學服務。只有明確教學為主的辦館思想，才能把全部工作做科學安排，分清主次，既保證重點，也兼顧一般。他反復說明對教學用書供應工作有正確認識，樹立正確的辦館思想，是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

報告還詳細介紹了北大圖書館做好教學用書供應方面的具體措施和經驗。強調了要做好教學用書的供應工作，必須做好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不斷了解情況，掌握教學活動的規律和特點。

二、“論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的報告

王重民先生在報告中指出：章學誠是我國封建社會末期杰出的目錄學家。他的目錄學思想是批判的繼承了鄭樵的目錄學方法理論，又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他從三個方面來闡述章學誠的目錄學方法、理論和觀點在我國目錄學上的成就和貢獻。

第一，正確地處理了學術研究與圖書資料的關係。他說，在圖書資料、學術研究與目錄的關係方面，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的學說，正確的反映了他在處理學術研究與圖書資料關係方面的最根本的思想。章學誠在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後，又解釋說：“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經皆掌故”，“六經皆器”，“政典”、“掌故”、“器”都是史，也都是指的圖書資料。章學誠認為，學問與圖書資料的關係，就是“道”與“器”的關係。這就提高了圖書資料的價值。

第二，關於章學誠的目錄學系統思想。王先生解釋說，所謂系統目錄學思想是指章學誠用社會發展史的观点，依據我國圖書資料的發展，系統地闡述了我國目錄學史有

关目录学的方法,理论和观点。章学诚的《校仇通义》第一章《原道》篇,是从人类社会进化到了古代文明的时期,有文字以后说起的,主要阐述了图书目录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校仇通义》的《宗刘》篇,说《七略》之流而为四部,“为势之所不容已”。那就是说图书的情况发展了,不能再墨守《七略》的分类,应当宗刘向父子目录学的方法理论,另创新的分类体系。章学诚面对这样的革新时期,他指出应该“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或者在“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企图在变革中还要提高目录的学术思想性。这些,都是章学诚系统目录思想中极重要的地方。

第三,章学诚发挥了分类著录辅助法——互著别裁的意义和功用。章学诚在阐明互著法的时候,首先申明了系统分类目录的重要意义。他说:“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可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只有在有了互著法之后,才更能发挥系统目录“绳贯珠联,即类求书”的功用。别裁法也和互著法一样,是当“理有互通,书有两用”的时候,在两个类目中“兼收并载”。它们的区别在于:别裁是把一书中遇到与其类目可以“互通”或“两用”的部分,“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所以“互著”与“别裁”方法的运用,都是在目录工作中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最灵活和必不可少的方法。

对章学诚系统目录学思想加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有的人认为章学诚系统目录学思想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历史主义,符合图书发展史规律,尚须作进一步探索。

三、“论推荐书目”的报告

朱天俊同志在报告中说: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来,推荐书目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专题著作选目”; (二)“读书计划”; (三)“阅读参考资料”。

“专题著作选目”一般总是针对一定范围内读者的需要,围绕一个比较具体的题材,选录一批与题材关系最密切的优秀著作,以满足读者选读某一方面优秀图书的要求。报告列举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来阐明“专题著作选目”的读者对象,题材以及如何收录与编排图书等问题。又进一步指出“专题著作选目”的应用等等。

“读书计划”是为了告诉图书馆员,尤其是中小型图书馆馆员如何通过有系统地介绍具有入门性质的各类读物,它和“专题著作选目”的区别在于:后者只能回答读者和馆员关于某一方面有些什么好书,而读书计划却能指导读者系统地阅读一些什么书,从而可以获得关于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

“阅读参考资料”是以广大读者为对象,通过推荐一部革命书籍以宣传好人好事。它不是以专题为中心选录图书,而是以一书为题,辅导读者正确理解革命书籍的内容思想意义。

四、关于我国科技文献工作发展趋势的报告

邓衍林先生在报告中,就我国当前科技文献工作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如下意见:

(一)科技文献工作组织问题。包括:(1)情报工作与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与工作内容问题。报告认为情报的范围大于文献。由于这两个概念尚未研究清楚,因此形成图书馆科技文献工作和科技情报中心的情报和文献工作之间的关系,难于明确划分。(2)科技图书馆网与科技书目协调问题,也是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科技文献资源与利用问题。包括:(1)科技文献的发展规律及其类型和功用的探讨。(2)科技藏书建设和文献志的体系和结构的研究,对于保证和提高文献工作质量关系重大,如何贯彻“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是提高质量的首要问题。(3)加速清理积压的科技文献,以便充分利用,是全国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急迫任务。

(三)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和方法问题。(1)报道与检索的关系及其要求。邓先生认为广、快、精、准为科技文献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建立科学的报道与检索系统,探讨检索系统的基本原理和索引方法,文献储存和检索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研究,是促进我国科技文献工作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并且认为已出版的各种定期文献志杂志,尚缺乏年度索引和多年积累索引,对及时检查利用感觉不便。(2)关于检索系统中采用分类法和主题法的争论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①两者优劣比较分析。②两者本质上的区别问题。③关于推广使用《国际十进分类法》的问题,意见甚多,尚不一致。

关于检索系统中采用分类法和主题法的争论,就最近发表的杜定友、刘国钧、袁翰青、丁珂和董健生等同志的文章研究中,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并且是相辅相成的。目前的趋势:分类法逐渐放棄傳統的线性系列的特点,而采取主题概念灵活序列的因素。主题也不采取单纯的机械的字顺排列,而探求主题概念系列化的组合,这就使主题法吸取分类法系统性的因素,因此,两者由两极相反而转变为两者相互结合为用的方向发展。邓先生认为从总的看来,应采取分类法和标题法两者并用的原则。

至于采用国际通用的《国际十进分类法》(UDC)为基础,是可取的。但邓先生认为采用国际十进法只能作为标引科技文献的标引类号看待,以便于各系统科学文献综合排列;如作为全国公认的普遍采用的分类法看待,就须要慎重考虑。

另外,图书馆学教研室一年来还举办过几次关于美国图书馆事业情报性质的介绍活动,如刘国钧先生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问题》,陈鸿舜先生的《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图书馆对亚非拉美地区进行文化侵略》和《两年来美国图书馆学活动的几个方面》及关一嫻先生的《十年来的美国图书馆建筑问题》等。

为庆祝武汉大学建校五十周年， 图书馆学系举行第四届科学讨论会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通讯组 卢中岳 沈继武执笔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本年11月该校五十周年校庆期间，举行了第四届科学讨论会。

这次科学讨论会，是在武大图书馆学系教师们广泛开展科研活动的基础上召开的。提交讨论会的论文有十五篇，内容广泛，涉及古今中外。论文以探讨高等学校图书馆的问题为主，包括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性质、任务、藏书特点、目录体系、读者特点、参考咨询工作、书库组织和阅览室的设置、干部培养等方面。大部分论文结合实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值得图书馆界认真研究、深入探讨。

参加讨论会的有图书馆学系师生、武大图书馆及武汉地区的湖北省图书馆、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等二十多个单位八十多位同志。北京图书馆丁志刚馆长也远道前来参加。

会议讨论了黄宗忠《办好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浅见》，徐家麟《试论科学图书馆在职干部培养提高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皮高品《再谈对图书分类法路向的看法》，孙德安《论高等学校图书馆目录体系》等四篇论文。并听取了黄元福《谈高等学校图书馆如何开展参考咨询工作的问题》，陈光祚、彭斐章《高等学校图书馆读者对教学用书需要特点的分析》，卢子博、沈继武、卢中岳《高等学校图书馆的书库组织和阅览室的设置问题》，王文杰、张安珍、王远良《论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宣传与利用的几个问题》，傅椿微、朱厚俗《高等学校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特点》，周继良《古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浅见》，吕绍虞《关于〈别录〉〈七略〉的几个问题》，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谢灼华《论“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等九篇论文的报告。与会者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会期间，武大图书馆学系全体师生及武汉地区的部分图书馆工作者，还听取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同志的题为《科学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及干部培养问题》的报告。

下面分三方面将会会议论的问题及报告论文的要点对述如下：

一、关于高等学校图书馆等方面的問題

对于高等学校图书馆等方面的問題，爭論有下述各点：

1. 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性质、确定藏书基数、稳定图书經費与人員定額等問題

黄宗忠的文章认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专业性的科学图书馆，它是根据本校所设专业来收集藏书的。就是综合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亦是专业性的。并且还是一个辅助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学术性机构。作者指出图书馆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搜集、整理、提供图书资料，实质上是整个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其收藏图书比较专深，服务对象的文化水平较高，因此其工作内容大部分是学术性的。高等学校图书馆要开展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研究，还是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研究机构。

对于确定藏书基数与稳定图书經費。黄文提出了高等学校图书馆藏书的最低标准：社会科学专门院校、综合大学、师范院校以每人100册，自然科学的专门院校以每人50册作为基数较适宜。并认为确定經費时应从二方面考虑：①在学校总經費中占一定比例。前一类高等学校占5%左右，后一类高等学校占3%左右为宜；②按师生人数计算，前者每人每年平均20—30元，后者每人每年平均10—20元。

至于高等学校图书馆人員定額，作者认为应考虑以下四点：①藏书总量与每年增加的图书量；②教师与学生人数；③分馆与阅览室的设置情况；④工作开展情况。据此，文章对人員定額，提出了一个最低的基本标准：5万册藏书，1,000名师生的图书馆，定員为10人。在此基础上，每增加2万册藏书，增加館員一人；每增加师生1000人，增加館員2人。

在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性质問題上。谢灼华同志不同意

黄文认为综合大学图书馆不能算是专业性的，它收藏的图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其与公共图书馆这样的综合性图书馆很难有本质区别。因此，高等学校图书馆既有专业性的，也有综合性的。其次，关于判定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学术性问题，谢认为应从其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的根本关系着眼，着眼于工作内容，从图书馆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积累资料、准备条件，与教学和科研有很密切的关系等方面来阐述，仅仅从高等学校图书馆是教学的辅助机构之一，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的高低等方面来阐述是不够的。

关于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否是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研究机构问题，谢灼华同志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开展这两方面的研究是作为业余工作来进行的，虽则这些工作带有很大的学术性，但不能因而将其认作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研究机构。

也有的同志更明确地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术性表现，一方面是与科学研究工作联系密切，另一方面是图书馆工作本身要从事科学研究。

对综合性大学与专科性院校经费的差额和图书的比例，陈光祚同志对黄文提出了补充。他认为文科师生用书品种多，但所需的图书主要是中文书，而理科师生所需外文书刊多，其平均价格比中文书刊高。这种区别在计算不同性质学校经费时应当考虑到。

不少同志指出，文章中列举的参考书指标1—30本幅度太大，学生一般参考书以30本为上限偏高。

关于干部的定员，陈光祚认为既要考虑数量，更要强调质量，干部的工作态度、业务水平、健康状况等都有很大关系。人的能动性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

2. 关于高等学校图书馆目录的职能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

孙德安先生《论高等学校图书馆目录体系》一文，阐述的中心问题是高等学校图书馆目录的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认为，读者目录带有推荐性质。但高等学校图书馆的读者目录不像大众图书馆那样，只收立场观点正确的书，不收任何反面材料和供参考的图书资料。不主张将参考性的图书集中编一套参考书目录，而主张分别编入学生用读者目录或公务目录中。这样将反面材料放在被批判的地位，便于研究批判，精简目录体系，查找节省工。并主张中外文图书统一组织目录及在公务目录中，将书名与著者目录合在一起，编成字顺目录。孙文还探讨了高等学校系图书资料室的图书目录，认为这是高等学校图书馆目录体系的特色之一，主张系图书资料室的目录应将中外文图书资料统一组织在一起，这种目录的结构可以结合本专业的需要，建立不同于总馆的目录体系。

参考性图书是否列入读者目录，牵涉到读者目录的职

能。会上有部分同志同意孙文意见，认为高等学校读者思想觉悟较高，辨别能力较强，进馆图书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可以通过分类编目将这部分图书区别出来，因而参考性图书可以列入读者目录中。不少同志提出了相反意见，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武汉师院图书馆、武汉测绘学院图书馆等几位同志认为读者目录要带有指导性，认为高等学校学生在校阶段主要是接受新的东西，正面的东西。而且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学生阅读尤其需要正确的思想指导，因此，参考性的图书不适宜反映在读者目录中。他们主张参考性图书单独编排目录。它的好处是：参考性目录本身已确定了一定的读者范围，体现出编目的思想性；其次，集中这部分图书资料便于查找，能便利特定的读者对象得到完整的资料。

另外，有些同志对其它二个问题提出了争论，不同意在公务目录中将书名与著者目录混合起来。认为公务目录无须两套。再者，他们还从实际使用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外文图书统一组织目录，无论对读者，对工作人员，使用起来都感不便。

3. 关于科学图书馆在职干部培养提高问题

徐家麟先生的文章，较全面地论述了科学图书馆干部的培养问题。对其学习的特点、内容和方式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着重阐述了正确处理在职学习中若干关系及从工作中培养提高的问题。认为“使用是更重要的学习”，通过工作实践培养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古今中外都曾把它作为一个正常的途径来使用。会上围绕这些论点开展了讨论。

沈继武同志不同意徐先生对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理论学习关系的看法。认为徐先生片面强调了实践，将工作与学习等同起来，忽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完成工作任务，并不意味着培养干部就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进行。干部通过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还必须经过有系统的理论学习，使实际材料总结上升为理论。结合实际学习理论，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主要途径。

北京图书馆丁志刚同志及湖北省图书馆、武汉测绘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同志，都从目前图书馆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对图书馆干部又红又专的要求。他们认为应针对目前干部的不同情况，结合在职学习的特点，为了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地进行。

与会者还对徐先生论述的学习中的若干关系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主要应归结为正确处理红与专、基础与提高及古今中外的关系。

在科学讨论会上作报告的，还有四篇论述高等学校图书馆某些问题的文章，现摘述如次：

陈光祚、彭斐章二同志的《高等学校图书馆读者对教学用书需要特点的分析》一文，从教学工作的规律与要求

这一角度，分析了讀者需要的四个特点为：①讀者需要的稳定性，②讀者需要的集中性，③讀者需要的可預見性，④讀者需要的阶段性。

黃元福先生《談談高等学校圖書館如何开展參考諮詢工作問題》一文，就如何开展这一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文章綜述了高等学校圖書館目前开展參考諮詢工作的情况及存在問題，指出參考諮詢工作是圖書館直接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基本方式之一，它包括諮詢解答和书目工作，其内容为：①帮助讀者檢查期刊目录索引，②进行一般性的口头諮詢解答工作，③举办重要工具书讲座会，④开展新书刊和专书专人报道工作，⑤举办主要专业书刊展覽，⑥編制专题书目和专题文献索引，⑦积累和編制資料摘要卡片。黃先生认为，要开展好參考諮詢工作，关键在于要調配更合乎要求的干部，不断提高干部的水平，并且要以图书作为物质基础，不断充实和整理館藏，为开展參考諮詢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卢子博等三同志的《高等学校图书馆书库組織和閱覽室設置問題》一文，概述了武汉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书库和閱覽室情况，強調設立单本书库和教师閱覽室。并认为书库組織和閱覽室設置，应考虑以下几点原则：①因地制宜，②保证藏书完整，方便讀者使用，③贯彻“区别对待，分别服务”的原则，④与本館其它工作紧密配合。

此外，王文杰等三同志的《論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宣傳与利用的几个問題》一文，从期刊通报、編制期刊目录索引、期刊閱覽和外借的关系等問題，来探討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的宣傳与利用問題。傅椿微等同志的《高等学校图书馆藏书建設的特点》一文，从高等学校图书馆藏书的专业性强、科学系統性强、教学用书多、古书外文书多等方面，論述高等学校图书馆藏书的特点。

二、关于图书分类法方面的問題

1. 关于图书分类法的路向

在武大图书馆学系第三届科学討論会上，皮高品先生曾对杜定友先生提出的分类法路向問題提出異議。此次科学討論会，皮先生再次提出爭議。他认为杜先生的建議，建立在英国布朗的《主題分类法》和苏联安巴祖勉的《图书分类表》的基础之上。认为杜先生的建議是行不通的。而对分类法的路向，皮先生提出六点看法：①分类的目的性要明确，要从实际情况出发，②分类要按体系，③分类法要适度的詳細，④輔助表愈少愈好，⑤分类号碼要用阿拉伯数字母，⑥分类法应有相关索引，相关索引应更詳尽。

會議圍繞图书分类法路向問題开展了討論。

周继良同志、湖北省图书馆張遵儉、昌少千等同志都认为杜先生的主詞分类法的建議，来源于民主德国的国家图书分类法。昌少千同志还指出，今后分类法的路向，不

是向簡的方向发展，而是向詳的方向发展。其理由：①中外分类发展史說明，分类由簡到詳，②当代科学愈发展，图书文献不断增加，要求分类法愈細愈好，③分类水平的高低，以是否与科学体系相符合而定，若三級类以下按字順，实质上是降低分类水平。

2. 古今中外图书統一分类問題。

周继良同志在《古今中外图书統一分类淺見》的报告中，主張古今中外图书統一分类，理由为：①按照一个思想体系来利用图书，不同意新旧图书按两种分类体系分开，②图书統一分类与指导閱讀不矛盾，③图书分类法中类目的設置与具体的归类应区别开来，④按照图书内容性质分类与图书所用的文字无关。中外图书統一分类不是文字問題。作者強調指出，古今中外图书統一分类，首先是意識形态問題，其次才是方法技术上的問題，应从理論和方法两方面加以解决。

三、关于目录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方面的問題

呂紹寔先生探討了汉代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二书中的五个問題，即《别录》的名称問題。呂先生认为就是《别录》，不是《七略别录》，②《别录》《七略》成书先后問題，呂先生贊同《别录》先于《七略》成书，③《别录》是不是一部有組織之书。他认为《别录》不仅已經分了类，而且还有总序一类文章，《别录》应是一部有組織之书。④《輯略》的内容問題。作者指出，《輯略》的内容可以包括《汉志》的总序，部序和类序三者，也可以仅指总序而言，⑤《七略》的互著別裁問題，呂先生认为《七略》既沒有互著，也沒有別裁。

謝灼华《論“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一文，綜論了二十世紀初年設立在浙江绍兴的公共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概論了它創办的历史背景，创办目的，藏书内容，工作方法，并将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归結为：①推动了我国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过渡，②促使图书馆管理方法上和管理制度上的改革，③提出了新的图书分类方法和編目条例。

陈光祚同志的《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論观点和实践活动》一文，是在上学期目录学教研室小型討論会討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作者作了較大的补充和修改。文章对我国近代目录学史新面貌的出現及其特点，资产階級目录学的发展，以及梁启超在近代目录史上的地位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科学討論会，由于提交討論的文章数量較多，限于時間，不少問題的討論还不够深入，有待于进一步探討。誠望全国图书馆学界同志們批評指正并共同來討論。